



范文澜 著

中国通史简编

上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范文澜 著

中国通史简编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通史简编 / 范文澜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 - 7 - 5675 - 2447 - 7

I. ①中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IV. ①K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81138 号

中国通史简编

著 者 范文澜
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
特约编辑 邱承辉
审读编辑 陈长华
封面设计 吕彦秋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,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 -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- 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 - 62865537 (兼传真) 门市电话 021 - 62869887 (邮购)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开 本 787 × 1092 16 开
印 张 39.5
字 数 64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 - 7 - 5675 - 2447 - 7/K. 408
定 价 88.00 (上下册)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- 62865537 联系)

序



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，我们必需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；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，我们必需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；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，我们必需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。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，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，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。

这样，研究中国历史，是每一个进步中国人民应负的责任。

中国是拥有五千余年悠久历史的古国，积累着丰富而又庞杂的大堆史料。甲骨钟鼎，经传诸子，史书地志，小说笔记，哲学宗教，诗文考证，歌谣戏曲，凡此种种，无不属于历史的研究范围以内。这不仅非短时期所得遍览穷探，在物质条件多方限制的环境下，也不允许这样做。可是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，却又必需向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。

如果利用二十五史、《资治通鉴》一类现成的史书来学习中国历史，是不是能收预期的功效？第一，这类包含千百万字的大部书籍，学习者哪有这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消费；第二，这类书连篇累牍，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，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，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，记载非常简略；第三，我们要探求中国社会循着怎样的道路向前发展，而这类书却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，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。一言蔽之说，这类书不适于学习历史的需要。

我国广大读者需要的首先是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，组成一部简明扼

要的，通俗生动的，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，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。

中国历史研究会同志们才力薄弱，不自揣量，草拟了这一部《通史简编》出来，不用说，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，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。我们知道，这仅仅是大胆的尝试，这仅仅是初步的探索，这仅仅是不值自珍的敝帚，这仅仅是聊备删削的草稿。我们怀抱着百分之二百的热望，要求大雅通人、先进硕士给我们严格的批评和指正。只有在批评和指正下面，才能完成写出较好通史的任务。

参加本书编辑的同志凡七人：谢华、范文澜分任第一编，佟冬、尹达、范文澜分任第二编，叶蠖生、金灿然、唐国庆、范文澜分任第三编，为了整齐体例，修饰文字，由范文澜任总编的责任。

今天，《通史简编》上册付印了，我们非常欣幸，因为我们将得到批评和指正。

中国历史研究会 1941年5月25日

再版说明

《中国通史简编》1941年在延安出版以后，各个解放区多有翻印，在蒋管区虽然遭受法西斯特务的禁止，但是1947年上海也终于印出了。这证明读者急需一部真实的中国人民的历史。不过在延安编辑的时候，因为材料缺乏，人力薄弱，仅仅一年半的日期，仓促脱稿，自然产生许多缺点，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，还有十万八千里。几年来接到许多珍贵的批评和指正，却又因为原来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们，都负担起另外的工作，范文澜同志忙于赶写近代史，所以始终未能修改。去年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成立，预计在近代史编辑完毕以后，把《通史简编》仔细订正。现在编辑近代史的工作正在进行，《通史简编》又须再版，只得根据原稿校对一遍，在个别问题和词句上略有改动，较详细的修改还得留待将来。

人民的历史，不是皇族的家谱。历代纪元年号，显然以天下为帝王私产，且时代距离不易省察；故本书对历代帝王直称姓名（为了方便读者阅读，少量地方编者作了注释——出版者），年次全用公历。为便于检查，将公历、年号、帝王姓名和帝号、制成简单的年表。中国历史到西周“共和”的时候，才有确实的年数，所以年表就从“共和”元年开始。年表把同时存在的主要政权、年号并列。年表仅仅为了纪年，其在纪年上没有多少作用的，完全删去，如公元304年从七月到十二月司马衷改变三次年号，删去“建武”、“永安”，只留下能继续两年的“永兴”；如公元494年南齐连换三个皇帝，删去萧昭业、萧昭文，只留下能继续五年的萧鸾。

参加本书校订工作的同志共八人：范文澜、王南、王可风、荣孟源、牟安世、高山、刘桂五、纪志翘。

这次只是微小的校订，深望读者再多给予严格的批评和指正，庶几将来能仔细修改，慢慢写成一部较好的中国通史。

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 1948年4月3日

关于《中国通史简编》

范文澜

《新建设》编者按：本文是范文澜先生在一个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做学习材料的机关里的讲话纪录。范文澜先生嘱本刊发表这个纪录，以供阅读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读者参考。

我对我写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是不满意的，早就想修改，但总没有机会。去年才开始改了一些，今天看来仍是不能满意，还得从头再来过。写一本书要错误尽可能少些，实在不容易，更不必说写得好了。希望同志们共同指出本书的毛病，做到像孔子所说的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”，指出很多毛病来，对我帮助就大了，可以改得较好些。

1940年我去延安，中宣部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《中国通史》，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。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，由我总编。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，稿子是齐了，有的太详，有的太略，不甚合用。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，1940年8月至1941年4、5月完成上册（五代十国以前），至年底完成下册。校完全书我就转入整风运动中去不再接触这个工作了。这本书原来限定写十几万字，但上册写完已有二十多万字，事已如此，只好不限字数，继续写下去。所以这本书是逐步扩充起来的，事前也缺少整个的计划和提纲（当时仅拟定略前详后，

全用语体，揭露统治阶级罪恶，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）。这就是编写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经过情况。

要写一本比较好的中国通史，必须具备着若干必要的条件，而我呢？这些条件都是很缺乏的。

第一，我的马列主义修养差得太多，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非常严重，没有力量来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而这又是写历史的第一个必要条件，缺乏这个条件，就容易发生错误。

第二，材料的掌握和历史知识也很差。延安马列学院的资料室参考材料不算多，那时要找《农政全书》、《天工开物》这类书都找不着，有关史学的杂志新书，更是难以看到。同时我的历史知识很贫乏，许多部门根本不懂或懂得太少，如少数民族史、自然科学史、艺术史、哲学史等部门，我都是门外汉，因之，有的说不出来，有的说得肤浅不扼要。

第三，有充裕的时间，才能仔细研究问题，考订史料，而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编写，时间却嫌过于仓促。恩格斯说：“即令是唯物的观点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的发展，也是一种需要数年静心研究的科学事业……只有多数经过批判的选择与全部精细研究过的历史史料，才能解决这样一个课题”。按照恩格斯的标准来看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真可说是粗滥的作品。

由于上面三个原因，可以得出结论，这本书不可能写好，序言上也已声明这只是一本聊备删削的草稿。这本书既然写得不好，那末是不是可以丢掉？是的，不久就可以丢掉。因为中国已经解放，史学工作者在共同目标下，大家都在努力研究，不久就会写出较好的通史来，代替这个写得不好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不过在目前这一种新型类的书还只好允许它暂时存在，虽然对它很不满意。原因是中国古代史书非常丰富，也有很多不朽的名著，但都属于旧型类，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。在真正科学的历史书出现以前，只要是尝试着用马列主义的观点、方法写的历史，总比旧型类的任何历史书要好些。这就是说，运用马列主义不成熟比运用封建主义很成熟的历史书，从人民的需要看来，显然前者比后者合用，即令不是真正合用。有些学者讥笑新型类的历史书说：“考订太不讲究，写历史闹出好多笑话！”照我的看法，尽管笑话很多，急须改正，但既然纠正了旧型类的历史书的某些根本缺点，这就是值得赞扬的。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也和其他新型类的历史书一样，毛病很多，远远不够科

学的水准，可是它比起旧的以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来写的历史书，却是本质上不同，许多写法在旧型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过。

第一，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，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。

第二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，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。旧历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，完全是静止的，有的“颂古非今”，什么都是古的好，思想更是反动，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，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。

第三，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，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，本书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（应该是四个时期，明以后自为一期），说明它的发展过程（当然，说得很不够，而且也未必说得正确）。从西周起到秦统一定为初期的封建社会。西周为什么是封建社会？今天不是专讲这个题目，无须多说，这里只说一点最简单的理由：根据地下发掘，商朝社会里阶级极显著地存在着，这是断定商朝决非原始公社的有力证据。贵族死后要用大量财宝和大批人殉葬。一个国王死了，殉葬人竟有多至一千人的。此外，每年祭祀，还要杀若千人同牲畜一样作祭品。一般贵族也起码要有几个人殉葬。至于周朝则截然不同，考古学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周墓，仅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。经书记载殉葬事，《诗经》秦风有一条，《左传》有两条（昭公十三年一条不计在内），《礼记》有两条，都是认为“非礼”而予以反对。例如《左传》记晋卿魏武子将死，嘱咐他的儿子魏颗一定要娶妾殉葬。魏颗不听，说这是“乱命”。又如《礼记》记陈乾昔将死，要求兄弟和儿子尊重他的愿望，给他造一口大棺材，让两个宠婢夹着他。儿子说：殉葬非礼，不能那样做。如果殉葬在周朝是一种制度，死者不必提出要求，儿子也决不敢反对制度。孟子引孔子说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，为其像人而用之也”，孔子专讲周礼，连俑都反对，足见周朝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。商与周是前后接连的朝代，但殉葬就有这样的变革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我以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于此。奴隶占有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区别，《联共党史》有如下的规定：“在奴隶占有制度之下，生产关系的基础，就是奴隶主对于生产资料以及对于生产工作者的所有制，这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一样来买卖屠杀的奴隶”；“在封建制度之下，生产关系的基础，就是封建主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

制，以及对于生产工作者不完全的所有制，这生产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，但是可以买卖的农奴。”根据上述原则，商朝殉葬和作祭品的人就是奴隶，商人信鬼，让死了的国王贵人在天上有奴隶服役（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奴隶）。周朝废除用人殉葬和用人作祭品，但并不废除用车马财宝殉葬，足见周朝不是因为不信鬼而不用人殉葬，而是因为农奴不能随意屠杀，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，残余的奴隶，活着有较多利益可图了。奴隶是能说话的工具，和牛马一样，要杀就杀，完全没有生命的自主权，给奴隶主工作，吃主人的饭，多余的劳动产物全归主人所有。农奴有点小的分地和小的私有财产，要吃自己的饭，穿自己的衣，养自己的老婆、孩子。《诗经·周颂·载芣》篇说农夫带着家里人去耕公田（“有 其馐，思媚其妇，有依其土”）。《良耜》篇描写农夫给封建领主耕地，互相开玩笑说：“或来瞻女，载筐及筥，其饔伊黍”，译意为：“你老婆快来看你了，拿着筐子，盛着好米饭给你吃。”西周初年，天子慰劳农夫给陈米饭吃（“我取其陈，食我农夫”又“曾孙来止，以其妇子，饁彼南亩”），这里说的黍米饭，当然是农夫自备。《载芣》、《良耜》两诗，说明当时的农夫耕公田吃自己的饭，而且有颇高的劳动兴趣。《小雅·大田》篇说：“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”，注疏家都说这是周朝“太平之时，民心先公之义”，其实不是这样；因为农奴在公田上工作完了以后，才能回到私田来工作，所以希望先下公田上的雨，随后下私田，以便得到时雨的好处。《周颂·臣工》篇“命我众人，庀乃钱镈，奄观 艾”。译意为：“命令我的农夫们准备你们的耕具，还要多准备些割器。”显而易见到公田服役的农夫，要自备生产工具。《资本论》劳动地租篇中说农奴制与奴隶制的基本区别点是“奴隶是用他人所有的生产条件”，农奴除给地主服役耕种外，自己还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（《大田》篇、《臣工》篇正说明周初农夫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）。《周颂》中所表现的生产方式，应该是周初的主要生产方式，从《周颂》看来，当时在公田上劳动的人主要是农奴而不是奴隶。这不是说周朝没有奴隶存在，相反，奴隶数量还是很大的，不过不是主要的生产者了。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历史学者，其基本论据建立在“重要生产工具，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”这个原则上面，依据《联共党史》所昭示，土地与生产工具同列于生产资料之内，土地不能当生产工具。所以用土地并非私有来判断生产工具私有的不存在，因而得出西周仍是奴隶社会的结论，似乎是值得考虑的。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化，

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上，不一定是决定性的。请注意：我不是否认生产工具的作用，只是说，同样的生产工具，在奴隶手中会遭受故意破坏，在“具有某些愿意从事劳动的兴趣”的农奴手中，就会提高生产效力，实际上发生了生产工具的重大作用。列宁《论国家》中说：“剥削形式的变换，把奴隶制度的国家转化为封建制度的国家。这是有极大重要性的。”证以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，曾大量使用铁制生产工具；到罗马帝国崩溃，封建制度开始，农具却十分简陋，主要的生产工具是木犁、木耙等，过了两百年，才使用带铁铧的犁和带铁齿的耙。足见过分拘泥于铜器和铁器，忽视其他许多重要材料，古代历史问题就难得通盘解释。以上所举西周材料，都是从从来无人怀疑的《诗经》里取来的，除非有充足证据证明那些材料出自后人伪造，否则就应该承认西周初年已开始了封建社会。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，远在纪元前 11 世纪，中国社会已进化到封建社会，为什么不引以自豪呢？当然，我们反对虚妄的“自豪”。但证据既确实存在，弃而不用，就未免可惜了。

西周开始时据说有大小国家千余，东周一百数十国兼并为十余大国，至战国只剩七个大国。这个阶段的特点是：从原始的小国割据分裂局面，走向统一，自西周至秦共八百余年，才完成统一。

自秦至南北朝，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。秦统一中国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大跃进。汉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；至三国时期，长江上游和中、下游建立起国家，开发经济，提高文化；后来长江流域的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，文化超过北朝，经济赶上黄河流域，至隋统一，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流域，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大地扩大并加强了，文化也跟着大进一步。

隋唐至鸦片战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。由于经济基础的扩大，文化也显著地超过前一阶段。宋朝开发了闽江流域（五代十国时王审知从河南带了很多人和生产工具去）。至元、明，珠江流域也开发起来了。自隋唐迄鸦片战争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黄河流域加长江流域，再加上闽江、珠江流域。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常朝代，一般约三百年，比前一阶段的正常朝代要多一百年（东西汉各二百年），这也可以说明唐以后经济基础确是扩大并加强了。

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，出现了汉、唐、明三个大帝国，也就清楚地划分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。反之，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，军阀混战割据，外族乘虚

侵入，出现分裂或沦陷的局面。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历史的命运，不看清这一件大事，等于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。

第四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告诉我们说：“一切至今存在过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”（就是用文字传下来的全部历史）。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写阶级斗争，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，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。旧类型历史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骂农民起义是“流寇”、“土匪”，描写成为野蛮人，把所谓“官军”的真正野蛮行为，大都挂到起义军账上。要矫正这种谬见，必须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，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，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度的推动作用。至于异民族侵入，我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。写农民起义和反抗异族侵略，本意在说明中国人民确有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伟大传统，但没有写好也是事实。

第五，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，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。例如炼钢、造纸、印刷、火炮的逐步发展，茶叶、早稻、棉花的大量种植。又如南宋江西、浙江有人使用投铁片入胆水，提炼出铜的方法。汉末曹操在冰井台藏石炭数十万斤。汉时高奴县（延安县东）发现石油，北宋用来点灯。唐时航海有大船，宋时航海用指南针定方向。诸如此类，自信在主观上是十分重视的（当然还有不少被遗漏），不过因为知识缺乏，没有能多所解释。

同志们听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，不要误会以为我在这里自我吹嘘。像我这样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，如果一下子能够写出科学性颇高的中国史来那真是怪事。这好像一个小孩子初学走路，东倒西歪，连跌带爬，不成模样。我们不能要求他一学就会，我们只能要求他不怕闹笑话，加倍努力去学习。

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有很多缺点和错误，我要写一篇“自我检讨”，希望发表出来，以便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中国通史的“定本”，同时也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，帮助我改正。我在检讨中所得到的对本书缺点的初步认识，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：

一、非历史主义的观点

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最长时期的封建时代，一方面是包含着许多甚至对于今

天的民族生活还起着负作用的沉重遗产；另一方面，也不能认为这段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民族生活的发展毫无积极作用，毛主席在《论新阶段》里指出：“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，我们应该给以总结，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。”《新民主主义论》里也指出，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，是发展民族新文化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。”这正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。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应该采取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分析的态度，对于个别的历史人物，个别的历史事件也同样应该采取这种历史的分析态度。如果无分析地一律抹煞或一律颂扬，都是主观主义的，非历史主义观点的表现。在这本书中的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点。例如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，就他们整个阶级地位来说，没有问题是有压迫人民、剥削人民的。但是他们中的某一些人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，确实也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，如果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，那是不对的。例如秦始皇嬴政，结束了从西周到秦朝八百多年割据分裂的局面，伟大的中国第一次统一起来。他废侯王，置郡县，兴水利，通河道，筑长城，统一文字，划一度量衡，拆毁国内长城，开发岭南，驱逐匈奴，建立规模宏大空前未有的大帝国。汉朝制度基本上承袭秦制，汉后历代制度又自汉制逐次演变而成，秦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创始作用，有极大的重要性，没有足够的叙述是不对的。汉武帝刘彻是雄才大略的皇帝。至少从殷朝起就侵扰汉民族的匈奴族，到汉武帝时，才打了决定性的大战争，汉族胜利了。当时匈奴还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国家，每年侵入边郡，破坏生产，捕捉汉人去当奴隶，打败匈奴完全合乎汉民族的利益。我对汉武帝的武功，没有着重写他胜利这一面，却着重写了人民所受战争痛苦的一面。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拔萃的人物。他击灭了侵略中国的突厥族，建立起疆域广大，超越前代的大帝国。汉唐是历史上两个光辉的大朝代，唐朝的强盛又胜过汉朝，我没有着重写击灭突厥的功业，却看作为他父亲李渊报仇雪耻的战争。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，很有功劳。明太祖朱元璋从元朝异族压迫下恢复汉族政权，也很有功劳，我着重写赵匡胤的官僚政治，朱元璋的专制残暴，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，都没有当作重点显著地写出来。

这本书中又有些地方因“借古说今”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。本来“借古说今”并不是绝对不可以，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

事，这就不是“一切以条件、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”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，而是古今不分，漫谈时事了。例如《中国通史简编》里叙述魏、蜀、吴三国的情形就有这个毛病。三国以前长江流域经济文化都落后于黄河流域，孙权建立吴国，推行北方的耕作方法，开辟耕地，又派朱应、康泰出使南洋诸国，组织一万人的大舰队开展海上交通，长江流域经济、文化比东汉前进了一步，这些功绩是值得重视的。蜀汉在四川、云南，对少数民族不采取残暴镇压的政策，汉族与少数民族一般能和平相处，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。三国分裂是军阀混战的结果，但三国国内设施，也各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，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，这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。又如武则天利用特务镇压她的政敌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争夺。借武则天来斥责特务统治，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，而且把宫庭私事也写了出来，意在增加对特务统治者的鄙视。事实上武则天统治的时候，中国还保持强盛的形势，对人民说来，她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。

以上就是由于片面地“反封建”和“借古说今”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。

二、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，头绪紊乱

列宁说：“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：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。”这种具体的分析，首先要把生产关系划分出来作为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，同时还要到处和经常考察那些适应于这些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物，以血和肉来把骨干包裹起来。但事情还不止于此，马克思说“同一的——就主要的经济条件说是同一的——经济基础，仍可由无数种互相不同的经验上的事情，例如自然条件、种族条件、外来的历史影响等，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差别来。不分析这种经验上给予的事情，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。”马列主义的分析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上，如此复杂而繁重，丝毫没有其他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以代替。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却采用了一个便宜方法来代替它，那就是现象罗列法，把互相有机系联着的统一的整体，排列成许多各个孤立的现象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，前一时期与后一时期，这一

事件与别一事件，同一事件在此时此地与在彼时彼地，说不出或说不清楚它们中间有什么有机的内部联系，结果是头绪紊乱，不相贯通，名为历史，实际上是一本史料汇编。对某些单独的历史事实，也因为缺乏分析，往往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。例如岳飞是抵抗女真侵略的民族英雄，它的行动是代表民族利益的伟大行动。他曾代表地主阶级攻灭洞庭湖旁农民首领杨么，这固然不是好事，但比起抗金来，显然是较小的，没有把事情轻重说明白，在鉴定岳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上，引起了混乱的看法。又如隋炀帝杨广开运河，给当时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死亡和痛苦，开成以后，北至涿郡，南达余杭，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起着重大的作用。杨广以前和以后，历史上不少开运河的人，杨广之所以特别著名，在于他使用民力太急暴，更主要的是他在河上作大规模的游行，为以前以后的人所未有。着重写了杨广残害人民骄奢淫逸，却没有说明开运河还有其积极意义，显得看问题不够全面。

除了以上所说两方面的问题，其他如使用材料也有错误或欠妥的地方，不少史学工作者，曾经善意地给我指出，我在这里表示感谢。此外没有检讨到的问题当然还有，需要自己更深入地作检讨，找出全部错误来。

我这样想：按照中国目前史学研究的已有成绩，要总结四五千年的全部历史，写出一本比较完好的古代通史来，无疑是困难的，但决不能因此而减损工作的勇气与信心，因为中国史学确实具备了几个决定性的成功条件，相信若干年后，比较完好的中国古代通史一定会出现。第一，毛主席已经指出史学工作者应走的正确道路。第二，中国人民翻了身，反动统治阶级基本上消灭了，革命的实践中已经给“一部廿四史”做了总结，这对于史学工作者，创造了来全面地总结历史的有利条件。第三，全国史学工作者组织起来，分工合作，或研究断代，或研究专史，或研究少数民族，或研究某一专题，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，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益完好。第四，全国史学工作者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，进行批评、自我批评，逐步改进自己的工作。这四个成功条件以外，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中国人民对史学工作者的期望和鼓励。

几千年来，中国人民千辛万苦，流血流汗，创造了自己的祖国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，既然是自己创造的，产生热爱祖国，热爱历史的心情，也是很自然的。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，劳动人民真正当了自己祖国的家，对自己祖先创造历史的勤劳和伟大，特别感到亲切与尊敬，要求知道创造的全部过程，为的承

继历史遗产，从那里吸收珍贵的经验，做更伟大更美好的新创造。历史上，中国劳动人民对自然界作斗争的生产斗争历史，对统治阶级及侵略民族作斗争的阶级的民族的斗争历史，都有非常光辉的成就。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，以各个不同的程度，参加这种斗争，全部或部分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，在政治经济上，在武力卫国上，在文化思想上作出许多大小事业，给历史以巨大的贡献，这与劳动人民的成就，同样值得人民的永远纪念与学习。把上述丰富的史实综合起来，就会基本上构成古代历史的光明面。当然，正因为中国人民充满着民族自尊心，所以特别愤恨自己的已往的奴隶生活与落后状态，对那些玷污民族名誉，出卖人民祖国，压迫劳苦人民，破坏经济文化，阻碍社会发展，毒害人民思想的暴君民贼及其所代表的反动地主阶级，表现无限仇恨，把他们的罪恶写在历史上，好让人民知道历史不是走的一帆风顺的胜利道路，历史走的是崎岖曲折，艰难困苦的道路。

古代留下来大量历史书籍，一般是地主阶级文士为拥护地主阶级利益而写的，中国人民需要的是人民自己的历史，而现在还没有，这就是为什么期望和鼓励人民史学工作者努力研究的缘故。我希望和全国史学工作者在一起，依靠四个决定性的胜利条件，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最大决心，同心协力，为写出一本比较完好的中国通史而奋斗。

并野、德远整理，克敏、王综校对

原载《新建设》杂志 1951 年 4 卷 2 期